

# 不合时宜的 人民领袖： 习近平独裁 权力分析（下）

**摘要：**本文上篇讨论了习近平上台前中共面临的权力困局以及习为强化自身权力与地位所采取的手段和策略，但要完整地解释习的独裁权力的形成，还必须深入其内心，了解、探讨和研究他的性格特质和认知模式。为此，下篇集中讨论习的人格特质及其可能后果。

笔者将习的人格特质称为“偏执人格认知模式”。每个人的性格中多少都有点偏执成分，但偏执型人格在医学上被认为是一种精神障碍，<sup>1</sup>以敏感、偏激、固执、多疑为特点，有此性格特质和认知的人，会特别坚持自己的一些观点、想法，情感也比较容易跟着想法走，并且趋于两极状态。例如，当内心认定某个人对他有威胁或者敌意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怒；相反则产生强烈的好感；还会觉得自己非常完美、同时非常固执，自命不凡，高估自身能力，然而遇到挫折，又很自卑；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不信任别人，集自卑和自大于一身。<sup>2</sup>

历史上的独裁者多半属于偏执型人格类型，尤其是那些改变历史的大独裁者，都是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病患者。习从过去10年的所作所为看，很符合对偏执型人格的描述。他的二十大人事布局，将亲信悉数提拔上位，除反映他的权力没有制约外，也是他气度狭小的表现，下面具体分析之。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一，是他不信任他的执政团队，只信任权力**

一朝天子一朝臣。对现代民主国家来说，新总统上任，一般会换上自己人马，新的内阁成员要么是在选举中为自己立过功的，要么是同党中德高望重的，要么和自己关系好，很少保留原班人马。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在关键岗位

也会换上自己人。然而，习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只用自己亲信。

中共用人讲究“五湖四海”，习也多次强调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要聚天下英雄而用之，虽然他从来没有做到这点，但是包括毛在内，中共建政后的历任领导人，在干部使用方面，还是比较注重不同派系和山头之间的平衡，尽管自己的嫡系在重要岗位上会安排得多一点，但也不完全排斥其他派系人马，如果某人真有真才实学，深得民望，还是能得到重用的。但是习的干部队伍来源非常单一，不是中共内部无人才，而是他只使用自己的“之江新军”，他们被安排在党的中枢机构、重要政府部门以及几个直辖市和经济大省。然而，即使对亲信，习也不完全放心、信任他们，经常要亲自领导、亲自指挥。

习上台之初，兼任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一直到现在。这固然主要是通过重置中共的领导结构从而实现集权之目的，可这一行为本身也说明他是要把权力紧抓在手上，不想有中间环节，否则在他实现了集权目的、大权在握后，完全可以把这些领导小组交给别的常委或亲信，但是他没有。这就是对权力本身的贪婪。习和王岐山的关系、他对刘鹤处理中美贸易谈判的干预，也能说明这一点。

王岐山做中纪委书记，习的目的是要他充当自己的打手角色，做恶人。在王完成了使命，帮习稳固了权力和地位后，习王联盟解体，王的亲信旧部董宏被抓，白手套企业海航被接管，<sup>3</sup>这背后不是所谓的功高震主，而是对王的习惯型猜忌：即使你是我的亲信，两人结成命运共同体，但对你仍然要防一手，把你的把柄抓在我手上才放心。美国对中国发出惩罚性关税的威胁后，习授权刘鹤负责中美贸易谈判，千辛万苦经过几轮谈判、眼看双方要达成结果，最后被习否决掉，致使特朗普很生气，将对中国的惩罚性关税扩大到所有输

美商品，并且税率加重。原因在于，习认为刘鹤没有很好地贯彻他的意图，对美让步过多，可能让他不好向国内保守派交代。刘虽是其亲信，但刘毕竟在美国留过学，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培养的技术官僚，本质上还是主张改革开放的，这就和习形成了某种理念上的冲突，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看法可能同习有某些差异，想借美国的压力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这就与国内保守派的利益产生冲突。<sup>4</sup>

习只信任权力，猜疑亲信，这可能和他的出身及家庭遭遇有关。习父虽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但在中共建政后受刘志丹案和高岗案的牵连，一直未得重用，在红色家族里是相对边缘化的。文革开始前，习家就已被打到，文革时期，习家更是被扫地出门，而这个时期的习不过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过早地尝到失去父亲权力荫蔽后的底层民众的滋味，实际上他比底层百姓的小孩更能感受到这种没有权力的痛苦，因为后者根本就不知特权的好处。在习后来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习和他的同龄人去陕北插队，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来送行的父母和家人，大家哭哭啼啼，唯有他冷冷清清，无人来为他送行。他后来说，那一刻他并不感到悲伤，因为前途虽然渺茫，但至少脱离了死亡，留在北京他很可能被打死。<sup>5</sup>

这个记忆透露出的信息是复杂的，有庆幸，有对前途茫茫的心酸，还有同他这个年龄不匹配的少有的冷静。对当时年仅15岁的习而言，他之所以沦落到发配边疆以逃避可能的死亡地步，不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被时代强加的。这种遭际，要比他的红色家族的其他小伙伴更早体验权力的重要和人生的冷酷。这是少年习近平的人生第一课。对于这一点，在他成年后是不会轻易对外界吐露的。不仅如此，习父在六四事件中由于没有站在邓小平一边，再一次在权力的斗争中被边缘化，虽然这次他的家族没有被清洗，但对

他的仕途多少会产生不利影响,使他再次体验到权力的重要。在后来二十多年的地方官场生涯中,他显示出谨小慎微,没有什么野心,应该与此有联系:权力才是一切,在一个人没有权力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时,收敛野心,应表现出对权力没有过高的欲望,从而让别人尤其竞争者放弃对自己的戒备。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二,是他所谓的不信邪不怕鬼,要领导中共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向世界表明人类不应只有西方的普世文明一途,还有中国为人类开辟的这条大道**

理论上讲,人类的多样性文明确实不应只有西方这条普世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但历史给出的答案,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没有第二条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习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中国有这个能力和义务为人类开辟第二条现代化新路。因为中国在中共领导下,而中共又在他的领导下。

对新冠的清零政策,最好不过地表现了习的这种不信邪的偏执型人格和认知模式。疫情三年,清零政策导致的大面积的人道灾难和对民众权利的侵害以及经济受损的严重程度,越来越暴露出来,远远超过该政策对民众生命健康保护的收益,大众和官员实际对清零忍无可忍,只是被当局强行压制。然而,习在“白纸运动”爆发前,就是不改变或修正清零做法,原因是在习看来,清零政策是现阶段既能防止民众大规模感染新冠病毒、避免死亡,又能让经济保持运转的最好方式。而他有这个认知,缘于中国在疫情防控的第一阶段,即德尔塔病毒传播的阶段,相当成功地做到了遏制病毒传播,少死人和经济较快恢复这两者的兼顾和平衡,这个时间段大概在2020年中。当局将之归功于习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归功于清零政策,认为中国是国际防疫的优等生,把中国的抗疫模式向全球推广。这个事实支撑着习对防疫和清

零政策的认知，让他偏执地以为按照这套清零做法走下去，中国是能够防住疫情同时又不对经济产生太大破坏。而经济剧降不是清零造成的后果，它是由别的因素引起的。

一个人不信邪不怕鬼（固执或执着）不一定是坏事，问题在于执着的事情是什么，方向对不对，如果事情本身的方向有错，那么越执着，副作用越大，后果越坏。中共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毛曾经尝试过，反右、大跃进、文革都可看作是毛式现代化的尝试和探索，结果失败，其后遗症和破坏性作用至今还在影响中国。邓小平接受毛的教训，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加上了“中国特色”的修饰词，但邓开创的、被江胡继承的这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习的道路有很大不同。尽管都强调共产党的领导，要维护党的统治，然而，前者并没有完全封闭向西方普世文明转向的可能性，但在后者则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成分；当局称它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中国方案”。

习认为，在他的带领下，中共能够走出这样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什么来支撑他的这种不服输、不信邪的精神呢？答案是，他迄今对中共和中国的成功改造。当大多数人认为中共的腐败无可救药，很少有人能料到，他真把反腐败这个事做成了，用雷霆霹雳手段把腐败压制了下去，虽然无法做到消除腐败，因为共产党的反腐完全不是为了建立防止腐败的体制。军改是又一个成功的案例。毛创建的这支军队虽然打败了国民党，在朝鲜战场也和美军打成平手，但在毛后期，解放军已变成装备、技术和训练都非常落后的军队，只能拼人数，靠军人的所谓意志和空洞的政治说教，丧失了它曾经应有的战斗力。邓的军改是大规模裁员，对解放军的体制机制和结构没有做改动，仍是红军

建制。习在军改上，倒是向美军学习，基本上是对解放军的体制进行重组，强化备战训练，当然还保留了解放军的一些所谓优势，如政委制度、政治宣传。总之，习成功地改造了中国的军队体制，把这个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做成了。此外，习对中共体制和文化的改造、特别是对中共的领导体制的改造，也是一个奇迹。在这几件曾被认为不太可能改变的事情上，习取得的成功无疑会强化他的偏执型的人格和认知结构，认为只要看准了方向，拿出一股子不服输精神，认真去做，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事不能做成的。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三，是他的装腔作势，显示自己有知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全知全能的领导人**

中国古代君王的理想或目标，是“君师一体”，这是因为儒家认为君王负有对臣民的教化之责，所以君王要成为一个好的、有思想、有道德的君王。中共也是以此来要求和塑造它的领导人的，党的每个领袖都被包装成无所不通的全才和全能型领导。但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全知全能领导。毛在中共的几代领导人中，是少见的文、史、诗都精通，又懂军事、战略和哲学的人。然而，即使是毛，似乎也承认他对经济是外行，不善理财，缺乏经济管理才能。毛曾同科学家探讨过科学，但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邓有行政管理才能和军事能力，但管理经济不如陈云。江和胡是技术出身，对自己的本行了解。虽然中共都想把他们塑造成全能领导，可至少给人的感觉，他们还算诚实，不刻意凸显自己的短处，让人认为自己是个全能领导人。

习不同，虽然论实际的文化程度和学历，他可能是中共这几代领导人中最低的；然而，官宣中的习，却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一样的领袖，举凡政治、经济、文史哲、军事、教育、管理、尖端科技乃至体育，他都了如指掌，大到

国家管理,小到足球,没有一个行业和领域,是他不敢发指示、下指导棋的。毛在他面前,也只能自惭形秽。

中共这种对习的全知全能领袖形象的塑造,恰恰暴露出他的无知和装腔作势。比如成为坊间笑谈的“背书单”,每造访一个国家,都要表现出他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熟读这个国家的经典作品的样子。比如去英国,大谈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简·奥斯汀、狄更斯;去美国称自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常识》、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等;每次去俄罗斯都要提到他读过的俄苏名著,如在索契参加冬奥会开幕式说自己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sup>6</sup> 人民网的“跟习近平总书记学读书之道”,列出了一份习近平提到的书名,囊括了中国诸子百家、儒家经典、西方传世名著,以及印度的宗教典籍、藏传史诗和少数偏僻的作品。<sup>7</sup>

习也许如他所说酷爱读书。在官媒吹捧他的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的采访实录中,习曾回忆当年插队带了整整两箱子书看。<sup>8</sup> 习父做过高官,家里藏书应该还是有的。但从习多次提到他在青年时代读过很多西方名著来看,显然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因为那些西方名著,内容多是关于自由、人权和民主的,而这在当时,不但绝对属于禁书,且发行量很少,文革期间更是抄家被收缴,即使官员也不敢私藏很多这种禁书。所以就算他喜欢读书属实,阅读的多半是当时流行的作品,如毛的著作,鲁迅的作品等,也许还包括苏联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另外习完全不像酷爱读书之人,不仅无法脱稿演讲,还几次念了错别字。他上台后实行的文化和宣传政策,与他读过的中国和西方名著所显示的价值取向更是格格不入。因此,要说他读过那些中外经典名著,也是白读了,没有给他的心灵和思想留下一丝一毫影响。



习的青少年,正碰上十年文革,他的真实学历,也就是小学。虽然学历低不代表没有文化、知识和见识,但前提是爱读书爱学习;就算习近平爱读书,他读的也不是他报出的书单上的大部分著作。中共的宣传部门和习的智囊班子为什么要给外界塑造他手不释卷的读书人形象?难道不知道效果适得其反吗?当局当然知道,可对他们来说,如果习因年轻时黑五类的待遇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心理始终存有自卑情结,而为掩盖这种自卑,他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广泛涉猎中外名著的领导人形象,以显示他有资格做一个大国领袖,那么,他们也只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但这个形象公关的失败说明,因为无知,所以要装腔作势,这正是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典型特征。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四,是他特能忍,在环境于自己不利时,有忍常人不能忍的精神和毅力,但也显示了他的决策犹疑和首鼠两端**

习特别看重战略定力,多次在大会小会和文章讲话中强调面对困难局面和复杂形势要保持战略定力。如在2020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他说“要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2022年3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谈到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时,指出要保持战略定力;四个月后的7月25日,在同党外人士座谈时,再次提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表示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是完全能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的;等等。

当局御用学者把战略定力解释成在错综复杂形势下为实现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所具有的战略自信、意志和毅力。<sup>9</sup>当人们说某个人有定力时,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不为外界某种诱惑所动,遇顺境或喜事不张扬不冒进,遇逆境或坏

事不灰心不丧气，耐得住寂寞，把它作为一种好的品格来赞扬的。不过，纵观习提到要保持战略定力，无一不是中共遭遇挑战，环境形势非常不利之时，这种情景下强调要有战略定力，说得好听点，是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打气，鼓舞士气；说得难听点，就是要能忍，忍别人不能忍之事，此即习所谓的战略定力。

他大概从韩信忍胯下之辱、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中吸取了灵感，认为成大事者需要在处境不利时头脑心态特别冷静；或者他从自己在梁家河的知青岁月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身处逆境，接受现实，放平心态，不怨天尤人，埋头苦干，等待时机。当年他去陕北梁家河插队，带着“黑五类子弟”的身份，实际是被发配到这个穷山沟的。同来的知青忍受不了梁家河的自然之恶和极度贫瘠的生活，没来一两年，通过各种方式走了，虽然他也溜回过北京，但最后只有他一人留了下来。他没有埋怨，或者说埋怨也没用，认命，但不被动等待，而是积极向组织靠拢，写了十几封入党申请书，终于感动了公社书记，不但让他入了党，而且提拔他做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取得了人生的第一个政治资本。<sup>10</sup>有理由认为，在他写十几封入党申请书时，并没有什么宏大理想，甚至都没想过这对帮助他走出梁家河能起什么作用。他可能只是机械地觉得，环境既已如此，不如接受命运安排，融入当地。但这个事也反映出他不一般的忍功。

不管如何看待习提出的战略定力，要保持战略定力，头脑就必须清醒，包括两方面：一是在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上要清醒，二是在观察外部现实和把握局势上要清醒。习也许对外部环境的险恶有足够认识，如在二十大，强调全党要经得起“惊涛骇浪”的考验；但从他对中美关系所做的“东升西降”判断来看，既高估了中国，也高估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在对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

上出现了方向性失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以致过早挑战美国，引发美国的警觉和打击，导致中国如今非常被动。但他又不敢承认错误，因为一旦承认是自己的战略误判造成今天的困局，他所刻意营造的权威就会坍塌，只好用“战略定力”来掩饰，自欺其人地认为时间在中国一边。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五，是过分重视底线思维，泛化底线思维，表明他内心的不安感非常强烈**

习有一种对他统治的中国深刻的不安感，这种感觉既是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治理情形太复杂，也是因为当下中国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是改革以来最差的；但它也很可能来自习少年时期作为“黑五类子弟”的经历。父亲在中共元老中被过早打倒，让习尚未成年即体会到失去特权的滋味，可以说，儿时成长环境的不友好，养成了他时刻防范人的心态。根据心理学的知识，这种儿时受到的心理创伤在一个人成年后会带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为一种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习对底线思维的强调跟他儿时受歧视而出现的不安感有直接联系。

那么，习的底线思维是什么意思？按照官方学者解读，底线思维是客观研判最低界限、设定最低目标、注重堵塞漏洞、防范潜在危机，立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结果的思维方法。<sup>11</sup>用习自己的话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sup>12</sup>换言之，习的“底线思维”是和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防患于未然。当局还在2019年1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将主题定为“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习大谈底线思维，强调要深刻认识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底线思维的一个表现,是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的发生。当局这些年非常注意这一点,习在讲话中也多次表示要预防出现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2018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从8个方面列举了16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风险。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分析了要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对美经贸斗争、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自身等8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2021年2月,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指中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也有来自自然界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而“黑天鹅”、“灰犀牛”还会在中共应对风险挑战时不期而至。在二十大报告中,他又进行了同样的表述。

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原本很可贵,不过,将这一思维方式泛化,反映了习对安全的担忧已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他要求官员们要像猎狗一样带着警惕的眼光,设想最坏的情景。而造成习这种安全困境的,正是他自己。对外要强出头,和美国西方搞坏关系,导致中国的战略环境岌岌可危;对内采高压统治,无论对民间社会还是他的党内同志,都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四面树敌。这种内外环境无疑会强化他的不安感,而不安感的增强反过来又会使得党内生态和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看似从最坏处入手,却未必能取得好的结果。原因在于,这种看问题的心态本身是病态的,在病态心理支配下的底线思维就难于客观评估现状、环境和趋势。

## 习偏执型人格和认知的表现之六，是容不得党内和社会有杂质，对建立一个干净政党和干净社会有一种病态嗜好

习在上个10年的施政举措，常被外界批评为要把中国带回文革。毛发动的文革，当然主要是权力斗争的考量，但也是想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习不会重回文革，可他确实想在新时代的中國建立一个干净的执政党和社会。他近年针对资本、平台科技企业、教培行业和演艺圈的系列打击行动，都是出于这一目的，例如，当局把对演艺圈的整顿命名为“清朗”行动，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在习看来，似乎一切都是不干净的，权力受到腐败污染，党政官员的腐败和官老爷作风败坏了风气，疏离了群众；思想和舆论领域不干净，还相当程度地控制在自由派手中，他们用各种方式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教培行业是不干净的，无序竞争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搞乱了教学秩序，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实现，不利于培养一代新人；演艺圈是不干净的，演艺明星不把功夫放在演技上，塑造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好角色，为社会传递正能量，而是追逐流量和吸金，用低级下流取悦观众，用娘炮文化污染青少年，让中国的下一代在这个伟大时代丧失斗志；资本更是不干净，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腐蚀官员，把手伸进各行业，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形成了垄断和控制性的力量，企图支配整个社会，尤其其中的大资本，利于平台和数据优势，垄断某些产业，阻碍竞争，不利生产力的发展，并利用这种垄断地位，藐视当局的监管，挑战中共领导权，想把中国变成资本实际控制的国家。

所以，要在中国打造一个干净执政党和干净社会，关键是如何处理资本这

个社会不干净的重要推手。和权力不同，资本有它的逻辑，不能简单套用治理党的一套做法，用纪律和道德去约束资本和资本家，这即是习强化对资本的监管，泛化国家安全，用网络法乃至直接用行政手段去打压和整顿资本的原因。

打造干净政党和干净社会，换个意识形态的说法，就是建设“纯粹的社会”，这本是宗教追求的目标，因为宗教才要求人类心灵的纯粹性，但它也符合共产主义的“大公无私”、消灭剥削与压迫的理念。只不过宗教通过宣扬爱和善来实现这点，而共产主义通过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习打造“干净的社会”实际也是向正统社会主义的回归。

领袖洁身自好值得赞扬，但如果领袖要求人人成为圣人，并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公共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推行建立一个“干净”社会，则一定会形成灾难。不幸的是，习恰恰是一个使命感特强的领导人，他丝毫不提自己家族的超级腐败和自己的毫无限制的权力，但却觉得有责任不能把一个不干净的社会交给中共的下一代。这种对干净社会的病态嗜好，恶果已经显现，它不但不能升华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反而让人人变成伪君子，并窒息资本的活力，让中国经济彻底躺平。

中共二十大让习获得了更大的独裁权力，在他追求的目标上，其偏执型人格和认知模式很可能让他把事情推向一种极端，直到产生破坏性后果无以为继。因此，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来看，无论他改造中共和中国是否成功，最后都会以悲剧收场。

注释 .....

- 1 见维基百科词条对“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解释: <https://tinyurl.com/prbbbufz>.
- 2 对此类偏执型人格特质障碍的描述,在网站上可以见到很多临床医学的描述。
- 3 董宏的最后一个职位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副主任,2017年7月,曾以中央巡视组组长的身份参与纪检工作。他2000年后与王共事多年,是王的下属,被认为是后者的“大管家”,2020年10月落马,后被判死缓。海航集团2021年1月30日宣布破产,其创始人陈峰曾是王的助手,海航被认为是王的白手套。对王和董宏、王和海航的关系,媒体都有大量报道。
- 4 见《纽约时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517/trade-xi-jinping-trump-china-united-states/>.
- 5 关于习近平延安插队离开北京火车站的情景,在事后不同人讲述的习的回忆中,有说没有家人来送,有说习的姐姐来送过,中共网的这篇文章 (<https://news.12371.cn/2018/06/29/ART11530256179130572.shtml>) 虽然交代有家人来送,但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个家人。文章透露的信息是习离开北京很高兴,不悲伤,笔者采信无人相送说法,可能更符合当时习并不悲伤的历史情景。
- 6 有关习近平出国访问背书单的事情,官媒有很多报道,已成为民间的谈资和笑话。
- 7 人民网:《收藏这份学“习”书单 跟习近平总书记学读书之道》, <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423/c164113-31684534.html>.
- 8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是由9篇采访实录组成的,该系列采访由中央党校策划组织,2017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里面有对习近平在梁家河读书生活的回顾。
- 9 王锁明:《大变革时代需要战略定力》,2017-08-11 求是网,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7-08/11/content\\_41389252.htm](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7-08/11/content_41389252.htm).
- 10 见《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
- 11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习近平的底线思维方法在浙江的探索与实践》, [http://zjrb.zjol.com.cn/html/2021-03/27/content\\_3422271.htm?div=-1](http://zjrb.zjol.com.cn/html/2021-03/27/content_3422271.htm?div=-1).
- 12 叶晓楠:《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51)》,2017年2月1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伴海的日子